

论以请求权为基础的环境权构建

代杰¹, 郝荣²

(1.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 100088; 2.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天津 301700)

摘要:在世界环境权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我国开展了对环境权的研究。而当前环境权研究中的突出问题是脱离法学规范和难于实证化。为此,应当建立以环境利益为基础、以自然人为主体的请求权性质的环境权。自然人可以请求政府积极行为以协助其充分享有环境利益。对政府的请求权意义上的环境权具有思想渊源和实证法上的正当性。其思想渊源的合理性来源于社会契约论,其实证法合法性来源于我国宪法的规定。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利益;自然人主体;请求权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039-03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Based on Claims

DAI Jie¹, HAO Rong²

(1. School of Civil,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2. The People's Court of Tian Jin Wu Qing Division, Tianjin 3017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world environment rights, Chinese scholars have also begun to study environmental rights.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current study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are that the study is out of the law norms and difficult to be based on evidence. To this end, environmental right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principal environmental rights are natural person. Natural person may request the positive ac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assist the full enjoy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Environmental rights have theoretical and juristical legitimac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ight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natural person subject; claims

环境权研究是我国环境法学界乃至法理学界的热门话题。对环境权的构建,似已成为环境法学安身立命的关键。准确界定环境权的含义是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之一。

一、环境权概念的理论背景考察

(一) 环境权概念的历史考察

法律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产物,环境权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步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但是从环境的角度而言该时期的发展是恶性的、不健康的,人们片面追求财富的积累而忽略了环境保护,对于工业发达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尤其如此。当人们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而迫不得已寻求法律帮助时,他们发现原有的法律包括私法、经济法和行政法在保护其环境利益上是苍白无力的。传统权利的爱莫能助催生了环境权的诞生。据考证,最早提出环境权概念的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萨克斯教授,其于1969年以“公共信托理论”为依据,提出公民享有环境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

过《人类环境宣言》,首次以环境保护的权利义务同时出现的形式规定了环境权。该宣言明确宣布:“人既有在足以保持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丰富的生活条件的权利,又负有为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严肃责任。”在《人类环境宣言》的影响下,环境权实证化进程始现端倪,不少国家将环境权纳入宪法或者环境基本法并给予保护。典型的如波兰、葡萄牙、智利、巴西、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家,而在美国和日本,环境权得以在司法中运用。^[1]

(二) 西方环境权理论和实践

环境权概念产生之后,便迅速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少国家建立了比较典型的环境权理论,并付诸实践。通过对典型的环境权理论和实证的借鉴分析,有助于我们总结得失、理清思路。

1. 日本

日本环境权的概念最早由仁藤一、迟居隆良两位律师在1970年9月22日召开的日本联合会第十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十大重点研究专项项目“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研究”(CLS10-9)

作者简介:代杰(1985—),男,湖北孝感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法学研究;郝荣(1985—),女,河北沧州人,法学硕士,主要从事环境法、刑法学研究。

三次人权拥护大会上提出。其认为,环境权既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也是私法上的一种具有排他性质的支配权。^[2]该理论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随后的关于环境权的讨论主要是以所有权为起点,认为环境权是享受良好环境并进行支配的权利,该权利包括要求恢复和保全健康舒适的环境的权利。

关于环境权的宪法依据,在日本主要有三种见解:其一是环境权以日本宪法第二十五条关于生存权的规定为依据;其二是环境权以日本宪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幸福追求权为依据;第三种见解是及应当以第二十五条有应当以第十三条为依据,二者不相排斥。^[2]在日本,关于环境权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环境权究竟是私法性质的权利还是宪法性质的权利,抑或二者兼具,都没有定论。不过这并不影响环境权已经逐渐被实证化和司法化。^[3]

2. 美国

环境权的概念在美国诞生之后,随即1969年其《国家环境政策法》就在一定意义上采纳了该概念,并规定了健康的环境权。该法规定:每个人有权享有健康的环境,同时有责任推动环境保护和改善。同时,该法确立了六项具体目标:(1)履行每一代人都作为其后代人环境受托者的责任;(2)保证为全体国民创造安全、健康、富有活力、符合美学和文化上优美的环境;(3)在没有造成环境恶化、健康或安全威胁或者其他不良的和不应有的后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4)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和自然方面的重要遗产,并尽可能地保持一种能为每个人提供丰富的多样选择的环境;(5)达到人口与资源利用的平衡,促使人们能够拥有高品质的生活和广泛舒适的生活;(6)增强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4]

美国法律在环境权问题上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联邦法院对联邦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不承认作为私权的环境权,但承认作为公权的环境权;第二,州宪法对作为公权的环境权基于有限的承认,但对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只给与政策性宣告。^[5]

(三) 我国环境权的理论研究

自我国著名的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于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环境权初探》一文以来,众多学者投身于环境权的理论论战中。然而,对于环境权是什么的问题,至今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权利说,到90年代的人权、应然权利和基本权利说,再到21世纪的习惯性权利乃至自得权说,等等。^[6]但是纵观这些学说,几乎所有都绕不开以下要点:1. 环境权的主体——

自然人、组织体、国家、动物和植物、全人类等孰为环境权的主体;2. 环境权的内容——环境权具体包括哪些权利内容;3. 环境权的义务人——自然人、组织体、政府、全人类等谁是环境权主体的义务人;(4) 环境权的性质——环境权究竟是人权、私权还是程序性权利;等等。

二、环境权是自然人以环境利益为基础对政府的请求权

有学者认为,界定环境权,应当以严格的法律权利的概念为标准,应当以法学规范界定环境权。^[7]可资赞同,本文认为:环境权,是指自然人请求政府积极行为以协助其充分享受环境利益的权利。

(一) 以环境利益为基础

环境利益是指自然人在良好环境中生存以保持其身心健康和精神愉悦的利益。环境利益不包括自然人对自然资源的经济性利益,因为经济性利益通过其他权利如物权、经济性权利等足以得以保护,不必以环境权保护之^①。当前,不少研究忽视环境利益在环境权界定中的作用,使得环境权与物权、经济性权利、行政权纠缠不清,似乎环境权在与民事权利、经济权利、行政权力“抢地盘”。笔者不禁要问,这样做究竟有无必要、有无价值?它既不能为构建独立的有价值的环境权和环境法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又无端冲击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造成法学体系混乱。另外,还有不少研究没有对环境权予以严格界定,把它变成了“口袋权利”。只要是与环境有关的权利,都归于环境权之下,贴上环境权的标签,似乎就成为环境权的内容了。例如,有学者提出嫌烟权这种权利是环境权之内容^[8]。试思:既有嫌烟权,就必有嫌辐射权、嫌光权、嫌热权等之类的环境权。似此缺乏严格论证的推演,使得环境权理论失去了探讨意义。

(二) 环境权人是自然人

若以严格的法律权利的概念为基础来探讨环境权,环境权的主体只能界定为自然人,而且不包括未来世代人。环境权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是因为只有自然人才存在对环境的保持身心健康和精神愉悦的利益,任何其他生物和组织体都无法享有,就更加谈不上环境权了。未来世代人也不是环境权的主体。未来世代人尚不存在,如何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权利主体呢?有人或许会拿民法对未出生胎儿的保护说话,但是民法对胎儿的保护并非把胎儿作为

^①有研究认为环境权包括日照权、通风权、采光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等。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环境权的内容,日照、通风、采光、安宁、清洁空气、清洁水等都只是充分享受环境利益的必要因素,也就是说,自然人要充分享有环境利益,必须要有日照、通风、采光、安宁、清洁空气、清洁水等条件。这些要素也可以转为民事权利来保障,也无须环境权的介入。

权利主体,并赋予其权利,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法政策的考量。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给未来世代人在当今社会设定代理人的方式来实现对未来世代人环境权的实现。^[9]该设想也不具有可操作性。简言之,代理人是谁,选定的标准和程序怎样,代理人违反了代理规则又当如何等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为未来世代人设定代理人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因此,对未来世代人的环境利益的保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以设定未来世代人为权利主体并赋予其环境权的方式来实现。

(三)环境权的义务主体是政府

环境权是相对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即政府,而非除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人。大须贺明指出:“国民对国家可以请求其保护良好环境的权利,则是社会权性质侧面的环境权。不管公私之性质,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对于企业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所实施的共发型规制,或者为改善已经恶化的环境所采取的积极性措施,都是由于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即为了对应社会权性质侧面的环境权而实施的。”^[10]之所以将环境权的义务人如此定位,是因为社会一般人侵犯自然人的环境利益,可以通过主张民事权利诸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转而实现救济,不必将自然人纳入环境权的义务主体的范围。有研究认为,环境权的义务人有两类,即第一类是作为第一位义务人的国家,第二类是作为第二位义务人的公民,认为环境权就是这么一种错位设计。^[11]该说法至少有一个不能解释的矛盾,即环境权属于绝对权还是相对权,相对权和绝对权的权利划分是周延的,而无论是将该种环境权解释为绝对权还是相对权都不合理。

(四)环境权是请求权

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因具有浓厚的社会性色彩而为典型的社会权,是公民和组织向国家请求的权利。与公民环境权主体相对应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而不是企业。^[12]该观点指出了环境权的性质,具有合理性。从义务的角度来看,义务主体承担的并非仅仅是尊重和不干涉,而是应权利主体的请求为一定行为以协助权利主体享受环境利益。也就是说,当环境权主体对环境利益的享有受有障碍或有受障碍之虞时,环境权主体有权请求作为义务人的政府为一定行为以协助环境权人充分享有环境利益。例如,某企业排放污水污染河流,致使沿岸居民身心受到伤害,居民便可以请求政府对排污者的排污行为予以处理,政府不得拒绝。这种请求政府介入的权利是环境权人享有环境权的表现。之所以将环境权定位为请求权,乃是因为当前环境权研究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脱离我国的法制实践,理论内容难被实证化,若将其定位于请求权,则有助于立法和

执法中将环境权运用到实际。

综上所述,环境权是自然人对政府的请求权,政府是自然人环境权的义务人,当自然人充分享受环境利益受有障碍或有受障碍之虞时,自然人享有请求政府协助的权利。

三、以请求权为基础的环境权的正当性

将环境权界定为对政府的请求权,除了具有法学科学性和体系和谐性之外,还具有思想渊源和实证法上的支持。

(一)思想支持: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的出现是人们以社会契约的方式转让其部分个人权利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私自利性势必会引发个人为了其狭隘利益不惜损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及其他正当利益,造成社会人人自危的恐惧状态,同时受害者的救济方式除了自力救济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绝对弱肉强食的状态。社会发展需要以相对和平为基础,这种相对和平状态的建立必然要求限制人们的自力救济权。人们似乎认识到,单个人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容易受他人侵害,为了避免这种无秩序的恐怖局面的产生,他们寻求一个足够强大且独立又中立于社会任何私人的第三者的保护。当每个社会成员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将其部分的个人权利转让给该第三者时,政府就出现了。所以政府是应人们利益保护的要求而产生的,所以当他人侵犯某个人的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私人可以请求政府为一定行为给予保护。这样看来,请求权意义上的环境权与社会契约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二)实证法支持

考察我国的法律体系会发现,将环境权定位为对政府的请求权具有实证法的支持。

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该条规定使请求权意义之环境权具有合宪性。由于公权力具有职权职责的统一性,无论是从那个角度来理解都可以发掘出政府所负有的环境保护义务。该义务从另一个方面讲也就反映了自然人的环境权。正是由于自然人享有环境权,政府才负有环境保护的义务。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该条通常被称为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原则。虽然该条仅仅针对的是地方人民政府,但不妨碍将它解释为地方人民政府负有环境保护义务。可见将环境权定位为对政府的请求权,具有实证法的支持。同时该定位也使得法律体系能和谐统一起来。

(下转第69页)

学呈对等的态势”^[10],有拔高之嫌。其实,这只是一种比附关系,而非对等。《国朝诸臣奏议》卷八二富弼《上仁宗论武举武学》:“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亦犹儒者治五经,舍之则大本去矣。”宋人李觏《盱江集》卷一七《强兵策第十》:“将之有兵法,犹儒之有六经也。”不难看出,宋朝谈论兵书时强调的都是“儒”的精神底蕴。因此《武经七书》的确定及改动体现的应是文治精神而非尚武之风。

[参考文献]

- [1]赵国华.武举与武学:唐宋兵学复兴的文化环境[G]//刘海峰.科举制的终结和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6.
- [2]周斌.从《长短经》看我国兵书三大疑案[J].西华师大学报,2007(1):57-61.
- [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卷三〇三,卷三四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何遽.春渚纪闻:卷五[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6]李锡厚,白滨,周峰.辽西夏金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 [7]聂鸿音.六韬的西夏文译本[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5):57-60.
- [8]钟焄.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正文的文献特征[J].民族研究,2005(6):85-91.
- [9]周兴涛.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四题[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7(4):95-98.
- [10]方震华.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J].台大历史学报,2004(33):1-42.

(上接第41页)

另外,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人们通常认为,本条规定的是公民的活的物质帮助权,看似与所说的环境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当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它,把公民活的物质帮助权理解为公民对政府的物质请求权,即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请求政府给予物质帮助的权利,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结构与所说的环境权是何其相似!所以在立法时,如果将环境权界定为对政府的请求权,就意味着存在着已有的立法经验可供借鉴。我想这大概对立法的科学性不无意义吧!

四、结语

环境权既不是人权,人权难于实证化;也不是私权,因为私权是民事权利而不是环境权。环境权是一种请求权,其请求权的主体只包括自然人,而且仅仅是现实的人而非未来世代人,其义务主体则是政府。当自然人充分享受环境利益受有损害或有受损

害之虞时,自然人可以请求政府为一定行为以保证其充分享有环境利益。

[参考文献]

- [1]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1995(6):61-68.
- [2]杜钢建.日本的环境权理论和制度[J].中国法学,1994(6):103-105.
- [3]罗丽.日本环境权理论和实践的新展开[J].当代法学,2007(5):152-158.
- [4]张一粟.美国法上的宪法环境权评析[J].财经政法资讯,2006(4):25-28.
- [5]王曦.试论美国联邦和州宪法在环境权问题上的发展[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88-91.
- [6]王小刚.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公民环境权理论述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63-66.
- [7]邹雄.环境权新论[J].东南学术,2005(3):134-143.
- [8]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2000(6):129-139.
- [9]林萍.关于环境权设置的初步构想[J].环境保护,2002(1):14-16.
- [10]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林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 [11]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 [12]赵红梅,于文轩.环境权的法理念解析与法技术构造——一种社会法的解读[J].法商研究,2004(3):43-52.

